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3.03.006

精准性与在场性的迁移： 水分配嬗变中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王毅杰, 孟皓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水分配作为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勾连着个体成员与乡村社区间的交往互动,基于滇西北地区 WM 村水分配实践,深入探究水分配嬗变中动态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精准性与在场性是水分配运行的两大核心要素,精准性凭借精确的时间单元格,生成成员行动的确定性与规范性,通过长期生产实践一般化为确定性与规范性,并最终构成乡村伦理规制的基础;在场性则以乡村社区成员身体为物质载体,端赖于身体参与实践,培育出共同体意识,进而生成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乡村伦理规制构成乡村社会的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而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则构建了共同体组织互动网络,在两者共同作用下维护乡村共同体的稳定。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与行政力量介入是水分配嬗变的两大诱因,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导致水分配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动,降低了水分配的必要性;行政力量介入则意味着行政权力的干预直接破坏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我”需要的原则,动摇了水分配的民间社会基础。伴随劳动力身体与土地的长时间分离,附着于土地上的规范性明显弱化,水分配中的精准性被削弱、在场性模糊化,致使乡村共同体基础受到冲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处理好年轻人身体与场的关系是精准性现代重建的关键。

关键词:精准性;在场性;水分配嬗变;身体实践;乡村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1;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3)03-0057-1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反映出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乡村振兴既是对乡村未来发展的规划,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乡村的具体实践,实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须避免“一刀切”,应辩证分析不同村庄的现实情况,切实把握村庄社会关系中的动态性。作为乡村社会运作机制的表征形式,水分配背后隐藏着身体入场、沟通交往和乡村规制等复杂关

系,而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传统乡村水分配发生嬗变,蕴藏其中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化。洞悉水分配嬗变中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国家更好地把握乡村社会中的微观互动机制。

相较于管理学聚焦水分配中的技术管理,社会学更关注水分配背后的社会关系。治水最初被作为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1],狭隘的国家决定论视角引发了格尔茨的批判,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地方社会^[2]。随后,学界关注焦点也转为复杂地方文化背景下的水分配问题。弗里德曼对水分配案例研究后,提出其背后隐藏着国

引用本文:王毅杰,孟皓.精准性与在场性的迁移:水分配嬗变中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3):57-6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SH042)

作者简介:王毅杰(1973—),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E-mail:wangyj_73@163.com

家与地方社会的松散关系^[3];杜赞奇则认为相对于国家,地方社会与水利的联系更为紧密^[4],在这两者的长期互动下,形成了以流域为中心的一整套地方社会运行秩序^[5]。因水分配不均引发的水纠纷,能够更好地洞见各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行龙基于明清以来山西水纠纷案件的研究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张力是水纠纷的根本原因^[6];赵世瑜则认为水是一种公共资源,一旦将水分配与土地捆绑,即意味着水资源失去了原本的公共性,转而成为私人用品。许多水纠纷或冲突均源于公权与私权间的矛盾^[7],为此一些学者开始专注于从产权社会学角度解释水纠纷问题^[8],在单一产权的基础上提出“复合产权”概念^[9],而张佩国等则认为过往研究未能跳出西方式产权理论的樊篱,提出应从地方性秩序的整体论来解释水纠纷问题^[10],还有学者关注转型时期中国的水纠纷与社会治理的关系^[11]。

上述研究多关注水分配与文化、区域地理、权力以及地方或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12],却忽略了水分配的本体研究和动态性关注^[13]。本体研究能够更好地呈现水分配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共有内核,而动态性关注则有助于理解嵌入水分配中的社会关系,并映照出乡土社会内部权力斗争、流动与平衡的动态图景。在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与较弱的社会流动背景下,有研究认为作为水分配主体,“沟长”工作轻松、社会威望和收益较高,引得各方角逐^[14]。然而,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传统的水分配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相较以往研究的不同——水管员不再是热门选择^①。水分配主体的改变,其背后的深层机制值得深思。据此,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水分配和乡村社会关系耦合的推力、水分配嬗变的诱因以及嬗变后社会关系的迁移。

二、研究方法 with 案例介绍

笔者采用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以及文献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于2021年3—8月对滇西北地区WM行政村进行实地调研^②。WM行政村距乡政府16.1 km,辖WM一组至六组、SM一组和二组以及MW一组至三组,共11个组;现有农户314

户,乡村人口1313人^③。由于地处高寒山区交通不便,WM村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形态,并于2014年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在传统文化仍占主流的村寨中开展水分配变迁研究,更能洞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动态性。

缺水是WM村最典型的特征,每年10月到翌年4月都属缺水期,农业耕作和人畜饮水都是难题。老辈村民经过不断思考、商议和协调,形成一整套科学的水资源分配体系^④:

首先,9个组^⑤每组安排一名水管员,外加一名总水管员,共计10名水管员。水管员任期5年,过去由全民选举产生,如今由各组长兼任。总水管员负责宏观调控水资源及安排水利设施维护工作,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各组水管员则负责本组具体水利设施的清理、维修和监督工作。

其次,全体水管员召集村民商定“水轮表”。“水轮表”是一种基于正义、公平和科学原则,对村庄土地定时供水的时间分区管理制度。在时间设置方面,依照各组土地类型、土地面积、农作物生长规律、人口数、海拔高低、与水源的距离等要素精准算出供水时间;在运行方面,源头的水被引入水塘后,根据“水轮表”时间确定各组放水先后顺序,组内成员的用水时间则由各小组水管员具体安排,例如,10月25日18:00—27日18:00由SM村二组用水,而小组成员内部水分配则由该组水管员根据海拔差异、农作物类别来确定^①。随着雨水季节到

① WM村水管员虽有每户10元/年的收入,但相较外出务工的收入相差甚远。水管员的选拔方式也发生变化,从民主选贤转变为硬性指定(各村民小组组长兼任)。

② 访谈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对乡干部、村民小组长、当地文化精英以及村民的访谈;文献资料则由乡政府、村委会和当地文化精英提供。

③ 数据来源于WM村委会。

④ 由于MW村距离WM和SM两村较远,且拥有独立水源,因此无水分配规则;而WM和SM两村共用一股水源,拥有两个水塘(WM水塘和GG水塘),WM水塘完全供WM村所用,无用水困难问题,也无明确的水分配规则;GG水塘情况最为特殊,需要供WM村、SM村和茶厂共同使用(茶厂地处WM村与SM村之间,属于WM、SM和MW三村共同财产)。本研究中的水分配规则特指GG水塘的用水规则。

⑤ WM村与SM村有8个组,外加共同财产的茶厂作为一个组,共计9个组。

来,水资源充沛,“水轮表”也随之暂时失效;在协同方面,当水轮期内遭遇较大自然变故,小组成员无法修复水利设施,则需全民协助修复。

再次,从表面看,水分配是当地水资源在物理空间内的再平衡,但从本质看,却是当地居民自身利益协调的一种重要手段,即当地村民通过水分配实现利益的均衡化,这种规则并非瞬时产物,而是长期交往互动、冲突、协调与再平衡的结果。那么,水分配规则为何能被当地居民长期共同遵守?萨奇曼指出,当一个行动者的行动与所处社会体系的规则、价值观以及信念保持一致时,则意味着这个行动者的行动获得了合法性^[15]。水分配正是通过获取乡村场域所赋予的合法性,才能得到当地村民的广泛认同与接受,而这种合法性基础则来自水分配规则在形式与内容上与乡村规则保持一致性。不论是组织机构的产生(民主选举)、组织的运作(关系原则),还是组织实践的方式(集体劳动)均与乡村规制原则一致,体现出乡村场域中公平性、民主性、公共性、共享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对等性等特征。因此,水分配获得了乡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不同于合法性认同具有的内生性,惩罚机制是通过赋予外部压力的方式规训成员的行为。WM村《水规》第八条和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全体水管员必须接受全民监督,如出现收贿等违规情况,全体村民将可联名罢免其职务,另选新的水管员”“农户若在维修水利设施中旷工将面临通报批评或罚款等处理”。正是凭借内外力共同作用,WM村水分配的民众基础被不断夯实与强化。

最后,水分配运作必须基于传统方式进行,任何个体或组织都无权对其内容进行随意改动。水分配是村庄用水规则制度化的呈现,体现了村庄的公平与正义,有助于村庄稳定和谐。此外,水分配中嵌入多组社会关系,如权利与义务、理性与非理性、顺从与违背等,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彼此作用,共同构建着WM乡村共同体。

三、精准性和在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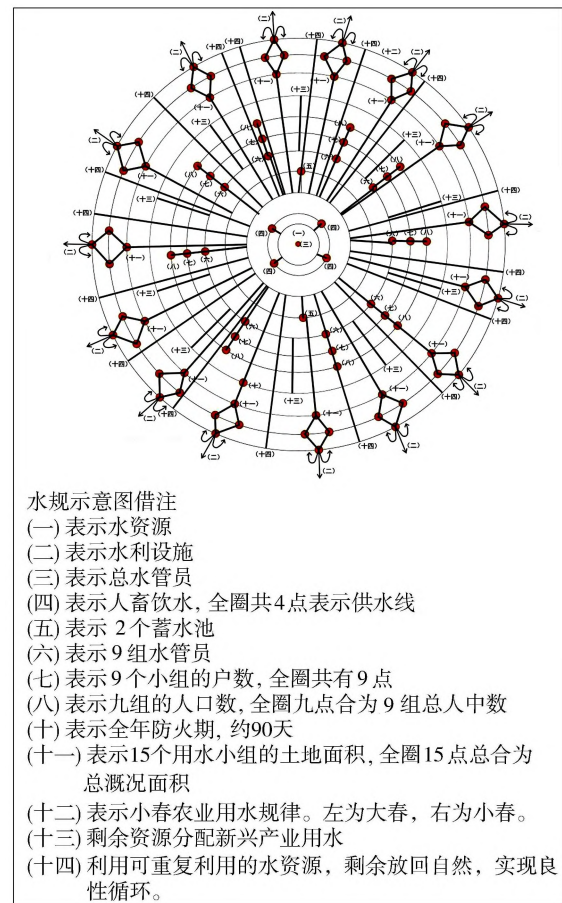
水分配与乡村社会关系耦合的推力

与现代社会不同,传统时期的村庄自成一体,成员与村庄社会资源之间保持高度的紧密性,其中与土地的关联度最高。水作为WM村土地生产中的核心资源,与当地社会关系结合

生成一整套与水相关的分配规则,而精准性与在场性则是水分配中的两大核心要素。

1. 精准性与在场性:水分配中的两大核心要素

水分配中的精准性,不仅指涉时间的准确性,也代表着村庄成员行动的规范性与确定性。时间的准确性是一种类似于时钟的计时规则,计算和规范着社会行动。人们通过生产出空洞化、抽象化、可计量以及标准量化的精准时间来规范个体的行动,避免“负担不起的时间浪费”^[16],保障劳动生产效率。WM村水分配精准性主要表征为利用计时方式整合现有社会资源,形成一整套与水资源相关的社会关系,包括水资源系统、水利设施、人员管理、供水线、用水规律等(图1),这些关系最终被物化为“水轮表”(表1)。



注:《水规》资料来源于和东巴。

图1 《水规》示意图

① 组间或者组内成员用水规则均是依照以下的原则:第一,当一轮用水结束后,组间用水顺序调换。如:从一组——六组,改为六组——一组;第二,大春时节,高海拔田地的收成更依赖于节令,因而用水先于低海拔田地;第三,小春时节,豆类比麦类的用水时间靠前且需求大,因而豆类用水先于麦类。

表1 “水轮表”

期数	SM村		WM村						茶厂
	一组	二组	一组	二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第一期	10月25、26、27日	10月28、29、30日	11月1日、3日1/2	11月2日、3日1/2	11月4日、6日1/2	11月5日、6日1/2	11月7日	11月8日	11月9日
第二期	11月10、11、12日	11月13、14、15日	11月17日、19日1/2	11月18日、19日1/2	11月20日、22日1/2	11月21日、22日1/2	11月23日、25日1/2	11月24日、25日1/2	11月26日
第三期	11月27、28、29日	11月30日、12月1、2、3日	12月4日、8日1/4	12月5日、8日1/4	12月6日、8日1/4	12月7日、8日1/4	12月9日	12月10日	12月11日
第四期	12月12、13、14日	12月15、16、17、18日	12月19日、21日1/2	12月20日、21日1/2	12月22日、24日1/2	12月23日、24日1/2	12月25日、27日1/2	12月26日、27日1/2	12月28日
第五期	12月29日、30、31日、元月1日	元月2、3、4、5日	元月6日、8日1/2	元月7日、8日1/2	元月9日、11日1/2	元月10日、11日1/2	元月12日	元月13日	元月14日
第六期	元月15、16、17日	元月18、19、20、21日	元月22日、26日1/4	元月23日、26日1/4	元月24日、26日1/4	元月25日、26日1/4	元月27日、29日1/2	元月28日、29日1/2	元月30日
第七期	元月31日、2月1/2日	2月3、4、5、6日	2月7日、9日1/2	2月8日、9日1/2	2月10日、12日1/2	2月11日、12日1/2	2月13日	2月14日	2月15日
第八期	2月16、17、18日	2月19、20、21、22日	2月23日、25日1/2	2月24日、25日1/2	2月26日、28日1/2	2月27日、28日1/2	3月1日、3日1/2	3月2日、3日1/2	3月4日
第九期	3月5、7、9日、4月7日	3月11、13、15、17日、4月9日	3月19日、23日1/2	3月21日、23日1/2	3月25日、29日1/2	3月27日、29日1/2	3月31日、4月4日1/2	4月2日、4月4日1/2	4月5日

基于“水轮表”，可窥见水分配中的精准性；其按照“期”的方式区分时间单位，一年分为9期，每一期大概在15~17天左右；每期各组的用水时长1~4天不等，这取决于土地面积、海拔、人口数、距离水源的远近等诸多要素；组间水资源使用权的交接必须遵循严格规范。此外，“水轮表”会依照各类农作物的需水时间进行精准划分，而大小春则一直都是WM村种植不同种类农作物的时间准绳。通常，人们习惯将每年5月至9月这段时间称为大春，而将每年10月至次年4月的时间段称为小春，当地大春作物主要有水稻和玉米，小春作物则主要包括小麦和蚕豆等辅助作物，这种相对固定的种植模式是长久以来农村地区综合考量生成的权宜之策，相应地，大小春时段农作物的灌溉时间也存在差异。

10月24日这天，WM和SM两村村民都会来到水源地引水，代表新一轮的劳动开始，也代表着“水轮表”开始运行。此后，两村的用水就要严格按照“水轮表”规定来执行。比如：按照“水轮表”，用水时间一般是头一天的18:00到下一天的18:00。前12个小时(18:00—6:00)，将水塘灌满；后12个小时(6:00—18:00)，将水放出。(村民HZY20210326)

这种分秒不差的精准性，以代际传递的方

式强化着标准化的时间单元，其逐渐区隔于那些依据农事节律而确定的农业自然时间，而后者大多端赖于农业个体的生命历程，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准则。精准性成为衡量工作效率的标尺，逐渐生成一种建立在规范性基础上的村庄社会格局，这种规范性不仅化解了因水资源匮乏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其充分考虑了村庄的物质基础，加入了准确性、公平性、效率性和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提供了村庄成员生计行动的确信性与有效性。

另一个核心要素是在场性可分解为“在”与“场”两层含义：“在”指涉主体的状态，“场”则指构成环境与事件的特定空间^[17]。在场一词，是指显现的存在状态，强调时间与空间的直接性，即即时与即地的属性^[18]。据此，可将在场理解为认知主体与周遭世界的一种位置关系，同时也是认知主体与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融合^[19]。本研究所讨论的在场，既包括存在样态，也包括互动关系。

WM村水分配中身体与在场紧密结合形成共生关系，社会关系凭借身体间的参与实践而产生，在场性的核心便是身体参与实践。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沟通多依赖面对面的实践活动，组织体系的建立同样端赖于此，例如，水管员选拔、水利设施管理、开会议事等，甚至村民动员、

风险应对也同样需要具身实践,遵循在场原则。组织成员身体需遵守身体参与实践原则,如若违反将被视为对规则的漠视甚至反抗,也将遭受民间权威的惩罚。此时,缺席的成员往往采用“他人替补”的方法来实现身体参与,即便该身体并非属于本人。

过去,不论是水管员通知开会还是修水渠,都需要本人到场;如果本人无法到场,也需要家庭中另外安排一个成员来代替(组长HD20210618访谈)

从案例不难发现,传统水分配运行的基础之一是身体参与实践,“他人替补”和“派代表”均可证明。这种面对面的身体参与实践,不仅是身体间互动的呈现,更建构了身体与村庄共同的集体记忆。当身体参与各类村庄公共事务时,无形中集体记忆将会印刻到身体,形成身体印象,这种印刻会将村庄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图景转化为成员的个体意识,驱动行为产生。身体参与实践培育了村庄成员的身体信任、身份认同以及彼此间的身体依赖性;长期的身体依赖关系又反向强化了成员间的交往互动,提高了身体在场性,正是身体的持续在场,推动了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

2. 乡村伦理规制与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精准性与在场性的内涵

在传统农业社会,村落之间在空间上处于相对松散与封闭的关系,彼此间难以建立共同性。村落的生产是内部再生产模式,它们独立培育下一代,而非依靠教育专家。在这样封闭环境下成长的青年个体拥有着与上一代相似的文化品质^[20],而这种文化品质的培育工具则被称为乡村伦理规制。乡村伦理规制是乡村个体成员在长期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整套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主要包括生产伦理、家庭伦理、交往伦理和治理伦理^{[21]92}。这套伦理规制赋予村庄成员精准性,即对生产规则、家庭地位、交往关系有着明确的价值评价与道德判断;同时,其又凭借村规民约规训着村庄成员身体,生成明确的行动边界。由此可知,乡村伦理规制具有两大功能:确定性与规范性。前者通过提供明确的主体关系、身份地位、交往规则以及发展目标,帮助村庄成员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

后者则利用乡规民约等规范手段对“偏离”的个体行为进行约束。

WM村水分配中的精准性,就是确定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就确定性而言,WM村制定的水规是以水资源为核心生成的一系列稳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充分考虑了水资源与村庄生产生活的紧密关涉性,以水分配规则来保障村庄的稳定发展。“水轮表”中灌溉时间的差异性,一方面,体现出因自然环境和农作物需水量不同,呈现出的供水时间差异;另一方面,水分配成为明确种植结构、确定村庄生计与未来发展的关键手段,水分配体系内容的详细与全面更映照出重视农业的生产伦理。此外,“水轮表”中精确划分的时间单元格,蕴藏着村庄成员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即在规定时间内,成员可以享受灌溉的权利;而在其他时间,则有义务对其他成员用水事实实现认可。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逐渐形塑出村庄成员明确的角色身份和责任意识,构成信任互助的基础。

事实上,信任互助是乡村交往伦理的内核^[22]。WM村水规中诸多规定都体现出“信任”“互助”这一精神品质,如:“水管员召开会议时,每家都需派出一名代表,并秉承互信原则,共同商议村庄用水问题”“共同协助维护水渠安全”等。正是依靠信任互助,水分配才获得组织正常运转的基础。相较于确定性中体现的生产伦理与交往伦理,WM村水分配规则的规范性,更多呈现出治理伦理的精神品质,而乡规民约是其重要内核^{[21]92}。作为乡规民约的一部分,水分配规则由乡村成员集体制定、共同遵守,其意义在于生发良善的自我管理意识,规制个体行动,生成公序良俗,进而实现乡土社会的稳定有序^[23]。从WM村水规条款可窥见,不论是水资源组织管理体系的建构,还是水利设施的维修与监督,均体现出对村庄成员行动的规范。合而观之,WM村水分配的精准性是通过确定性和规范性来实现,确定性构成了乡村伦理规制(生产伦理、交往伦理)的基础,而规范性则生成了乡村伦理规制(治理伦理)的内核。

水分配的身体在场性具有特定空间内、身体互动、面对面等鲜明特征,其源于日常生活世界,同时又形塑着生活世界。稳定的身体在场

建构出交往行动,并推动行动制度化产生,将原先那些碎片化的经验材料组织、塑造与重构,生产出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稳定形态,而这种制度化形态又会塑造其中的个体,影响后者的行为方式。因此,水分配中社会交往行动是以面对面的身体在场作为前提。身体在场不仅提供实践保障,更重要的是传递着共同参与之共同体意识。滕尼斯运用“默认一致”来指涉共同体成员在生产、生活以及交往中形成的高度同质性的共同体意识^[24];涂尔干指出,伴随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也在增大,然而生产与消费上的依赖性,又决定了共同体意识将长期存在^[25]。WM村水分配中大量身体在场实践(引水渠、修水管),无一例外均强调着协同、共享、公共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既降低了村庄抵御自然风险的成本,又能强化利益共同体的组织基础。正是端赖于共同体意识将原本松散的个体结成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生产出相关的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如:选拔机制、管理机制、动员机制、激励惩罚机制、风险应对机制等。上述社会组织机制均基于身体在场的原则,水分配也被看作一个庞大的身体在场系统,无论是选拔机制,抑或激励惩罚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端赖于身体在场。身体在场是将身体嵌入到“场”,实现两者的融合,此时的身体具有了“场”的特征,相反的“场”也会嵌入身体,具有后者的性格,两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此外,水分配的生成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数次商议互动的结果。如果说一次的缺场可用其他身体来替代,那么多次缺场则会导致身体在场的意涵被破坏,因为身体对应的角色是在一次次的在场中得到反复确认,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被进一步夯实,缺场的出现可能破坏原有

的关系,动摇了村庄共同体的根基。

我不可能外出打工,因为我是水管员。村里水的分配、水利设施的维护都需要水管员来负责。另外,会议也是由我来组织,安排各个家庭成员到场;如果多次不到场,他们家的资格会被取消。(水管员 YD20210706)

综上,精准性与在场性是水分配规则中的两大核心要素,其背后隐藏的是乡村伦理规制和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前者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搭建起乡村共同体的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而其中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都被内化至成员身体,形成稳定的互动关系;后者将分散的个体集合为制度化的共同体组织体系,形成统一行动力。而乡村伦理规制与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共建了乡村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图2)。需要说明的是,在外部因素未介入的情况下,水分配与乡村共同体之间是一种稳定的关系,其彼此构建、相互作用,都凭借精准性与在场性实现运转。

四、理性选择与行政力量介入： 水分配嬗变的诱因

伴随外部环境改变,传统的水分配不再牢固,构成要素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水轮表”和水管员功能弱化、水分配生成的社会关系松散、行动者生物身体与社会身体分离等。事实上,水分配嬗变的诱因众多,本研究无法一一罗列,将重点介绍两个根本性诱因。

1. 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

成本与报酬是理性主义的重要概念。传统时期,WM村庄成员遵循传统的生产消费路径,“土地耕作—粮食生产—自我消费”,形成封闭的内循环。村庄内部各个要素彼此协调、相互作用,在遭遇外部压力时,村庄内循环机制就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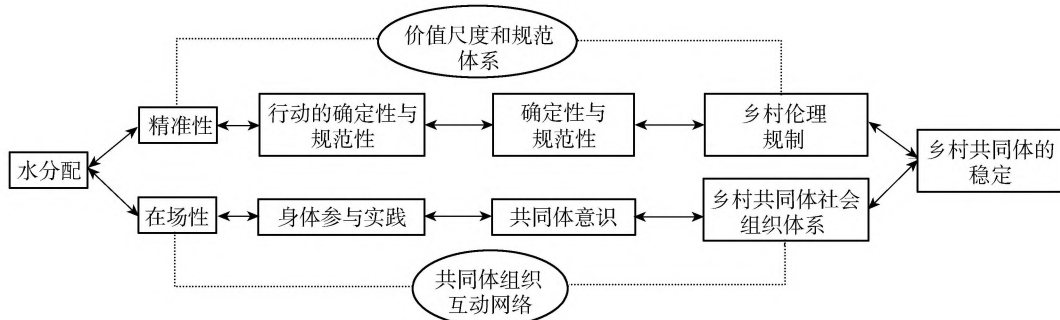


图2 水分配机制的运作逻辑

发挥作用,缓和或化解矛盾。因此,成本与报酬的理性选择意识是完全依附于农耕社会的基本需求法则。随着城镇化推进,原本的封闭内循环逐渐被打破,村庄成员在市场经济下展开了成本与报酬的理性选择。由于水稻种植需要大量人力成本,而这种成本村庄无力提供,且种植水稻的收益率也未明显高于玉米,以上因素叠加导致村民在耕种问题上作出了理性选择——水田改为旱地以及玉米种植取代水稻种植。外出务工青壮年给予原生家庭的经济补贴又在很大程度上填补水田改旱地、玉米替代水稻的经济损失,留守村庄的老年人可以利用这部分经济补贴从市场中获得更加优质的粮食资源。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促使水分配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动,诱发了水分配的嬗变。

现在家里的水田大多都已经改为旱地,不种水稻了。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水稻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家中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没有劳动力,我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第二,旱地可以种玉米,在玉米上投入的精力要小于水稻,比较划算。(当被问到家中吃的口粮时)儿子在城里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2000块。不论是家里吃的大米还是其他商品,都可以拿这个钱去乡里购买。(村民YDS20210515)

2. 行政力量的介入

对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国家投入是极为必要的,然而,行政力量的介入需有限度,一旦参与过度反而会挫伤民间社会的积极性。对于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需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政府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村庄自身特点。村庄内生动力催生了自主性,而自主性又是村庄发展的关键,缺乏自主性将难以实现村庄资源的内外联动,外部政策也就无法取得良好实施效果。WM村属于自主性较强的村庄,村庄中的许多公共事务都会通过家族商议来实现,这种方式既能保持家族成员间良好的互动,又能增强村庄的凝聚力。然而,近些年行政力量的介入直接诱发了水分配嬗变,使原有的村庄共同体根基松动。

以前,水渠的清理是村中一项公共事务。正月十六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去修理水渠;如今,这项公共事务停滞了,原因在于2015年

和2016年政府出资来修理水渠,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延续性。因为财政经费不足,2017年就中断了,自此,这项全村人集体完成的事情也就再也没恢复起来了。现在都是水渠出现问题,再派几个人临时去修理。(村民YHZ20210426)

第二,政府应遵循村庄“自我”需要的原则。民间社会与地方官员的需求存在差异性,民间社会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满足生活和发展需要,而地方官员则体现在政绩需要。为获得政绩,地方官员可能会选择一些容易被量化的项目来凸显绩效,而税收作为重要的考量指标成为首选。烤烟是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能够带来丰厚的税收回报,因此,当地政府要求村庄优先种植烤烟^①。种植烤烟需要持续的水源灌溉,这与“水轮表”中灌溉时间的精准性相冲突,无疑影响了当地长久以来的水分配规则,而水分配与村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联系紧密:一方面,水分配规则将时间分隔为不同的单元格,每个单元格中规定了权利和义务,而社会关系就在这些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建构;另一方面,通过水分配规则规范了当地的社会秩序,进而塑造了社会结构。当外部力量介入,最先破坏了原有水分配中的精确性。原本人们在精确性中获得确定性,一旦这种精确性被破坏,确定性也就无法获得,人们将在不确定中迷失自我。

乡政府要求种烤烟,说这个赚钱,在每年5月初就开始发放烟苗。因为种植烤烟对水的需求很大,5月份开始就要持续用水,从播种、拉“十字”、定苗到成苗的过程都需要用水。这时候,一些种得迟的小麦也需要用水。而在6月初,就要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此时也需要大量用水,所以就出现用水冲突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村民HZY20210326)

五、水分配嬗变中的社会关系

就精准性而言,时间单元格的明确划分是

^① 2000年伊始,当地政府引入烤烟种植理念,鼓励和支持当地村民种植烤烟;随着近些年国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政策的强化,地方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从公开支持转变为保持沉默,但因当地并无规模产业以及土地流转现象,因而当地村民依旧种植烤烟(截至2023年3月22日,当地共有21户种植烤烟),而地方政府也未有针对农田种植烤烟的相关管理措施。

为了生成确定性和规范性,明确并规范成员的个体行动,进而营造村庄公平的氛围。然而,伴随城乡流动加速,大量青壮年走出乡村流入城市,他们的离乡也造成了村庄“空心化”的事实。人口流动^①导致村庄成员谋生方式从内生型转为外向型,原本身体与土地的紧密关涉性减弱,土地的重要性随之下降,附着于土地的规范性也被弱化,此时,村庄成员的行为不再受限于土地精准性这个单一因素。村庄成员执行水分配规则时,并不需要严格履行“水轮表”中的精准时间,可根据自身需要提前或者延迟灌溉。这种做法在过去可能会激化邻里矛盾,而如今却并未造成冲突。正如村民所言,“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放水早点、晚点没有什么关系,反正现在土地也没人种,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村民 HHD20210504)

相较于传统水分配规则下村庄成员明确的生计行动,如今村庄成员的无所适从,更能反映出村民的一种不确定性。“不知道种什么”以及“没有大的影响”都说明了村民对于嬗变的水分配规则持有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水资源的重要性随着土地规范性减弱而进一步弱化,时间的精准性也就逐渐失去原本的必要性。

事实上,WM村水分配中的精准性并未完全消解,呈现出内容上“弃”与形式上“留”的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主要基于水分配与劳动力身体的互动关系。过去,水分配中的精准性直接规训了劳动生产场域内的劳动力身体,这些身体大多是以青壮年身体的形式呈现,而老年身体往往缺场。如今,大量青壮年身体在农业劳动场域内缺场,精准性的规训力式微,集中表现为前者对于后者的注意力在减弱,因而,实现了水分配内容上的“弃”。此外,即便老年身体长期缺场于劳动场域,但往往拥有共同的劳动身体在场历史记忆、共同的精准性认同感,这无疑维持了“水轮表”中精准性形式的完整,呈现出水分配形式上的“留”。

“水轮表”肯定有用,几百年都是这样的。如今灌溉用水的时间还是依照“水轮表”,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随便改。要继续沿用下去,这是根,不能丢。(村民 HXL20210408)

过去,村庄成员的行动有明确的规范准则,这种准则给予成员确定的认知模式和明确的生

计目标。如今,水分配内容上的“弃”与形式上的“留”带来的模糊状态,反映了村庄成员对于村庄未来及个人行动目标、方向、模式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性更多来自现代文明规制的挤压,导致行动者产生的一种“不适应”。事实上,精准性减弱背后是乡村伦理规制的弱化。过去,村庄成员凭借乡村伦理规则获得明确的生产关系、家庭伦理、交往逻辑和乡村治理手段;然而,在高流动性的当代社会,这套逻辑原本的效用与功能在持续减弱,人们需要重新思考村庄的未来。

身体不在场也在社会流动加速下逐渐显现,呈现出身体在场与不在场并存的模糊化状态,这种状态正是理解水分配中空间结构和关系变化的关键。两者并存重构了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出一种在场与不在场混合的形态。然而,这种形态具有流动性——一种未定的状态——会导致无知感、无力感以及忧虑、担心的出现^[26]。

得益于现代科技手段,身体与空间的分离并不会立刻导致社会关系的中断,其他联系仍在发挥作用,其将原本紧密相连的时间与空间分开,形成了时空分离。此时,与空间结合的身体也开始产生分化,导致生物身体与社会身体分离。生物身体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理躯体,而社会身体则是以身体为媒介建构起来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集合。过去,社会身体依赖于生物身体,相互结合统一于共同的时空内;如今,两种身体之间关系松散,社会身体不再完全依附于生物身体。凭借技术手段,社会身体可以脱离生物身体实现一定的社会互动。时空关系也在两种身体的分离过程中实现迁移,生物身体不再被局限于特定的空间场域,通过远程通信手段的方式可获得一种临时性的效用。然而,这种效用是不稳定的、暂时的、流动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本身体在场的功能,但是社会关系的稳固端赖于长期的身体实践过程,多次

^①除人口流动外,在全国范围内极为常见的土地流转也应是导致身体与土地的紧密关涉性减弱的重要原因。但据笔者多次核实,由于当地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加之严重缺水,并未有企业组织洽谈土地流转事宜(仅有少量承包土地种植果树现象),因而土地流转难以影响当地的水分配嬗变。

身体不在场会削弱参与实践的效用,导致嵌入身体参与实践规则中的公平、正义、共享等共同体意识下降,进而推动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的解体,例如,WM村水分配管理人员从全职到兼职,议事组织的分解等。

现在与水分配相关的机构越来越少,以前村里有水规议事会,专门讨论水分配,现在都名存实亡了;过去水管员是个肥差,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去做,没办法只能让村民小组组长兼任。(村民 HSW20210520)

综上,精准性的削弱导致其中确定性和规范性的衰微,无法提供实质上的支持,因而呈现出内容上的“弃”;然而,老年身体拥有着在场历史记忆和精准性的认同感,无疑维持了形式上的“留”,产生“空洞”的“水轮表”:一方面,精准性削弱背后是乡村伦理规制约束力的下降,主要体现为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的弱化;另一方面,身体在场与不在场共存导致了原本的身体参与实践规则被破坏,共同体意识下降,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解体以及组织互动网络受到挑战。即便技术手段可以在短期内替代身体在场,就长期而言,建立在实践规则基础上的身体在场将被身体不在场所替代,最终还将引发当地社会关系的变动(图3)。不同于传统水分配与乡村社会关系形成的一种互构关系,在水分配嬗变的今天,双向互构关系已然消失,原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

生成的一种带有明显策略性的管理手段,实际上,它却是成员交往互动与维持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载体,如果只关注水分配的技术管理层面,而忽略隐藏于背后的互动关系以及机制运作逻辑,将无法准确理解“变化中的社会关系”。立足WM村水分配这一微观经验现象的变迁过程,本研究对水分配嬗变中“动态的社会关系”进行中观层面分析,探索蕴藏其中的一般性原理。研究发现,精准性与在场性是水分配逻辑中的两个核心要素,精准性通过划分精确的时间单元格,规范行动者行为,并生成一种确定性认同,该认同赋予行动者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场性则通过身体参与实践的方式推动身体间的互动,强化共同体意识,构建了当地的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前者提供了行为的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后者则维持了身体互动频率,巩固了共同体组织互动网络,两者共同塑造出稳固的乡村共同体。

而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和行政力量介入是水分配嬗变的主要诱因,水分配在外部力量的挤压下产生形变。村民谋生方式的转变,导致土地规范性弱化,进而削弱了水分配中的精准性,因此,精准性生成的确定性与规范性也随之减弱。此外,社会流动和现代科技推动了身体在场与不在场共存,导致共同体意识下降,最终推动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解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嬗变并未完全摧毁原有关系结构,因而也就未能产生新的社会结构,更多是一种流动和未定的状态。笔者认为导致这一流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村庄成员对于外部环境变

六、结论与讨论

水分配看似是乡村社会基于水资源匮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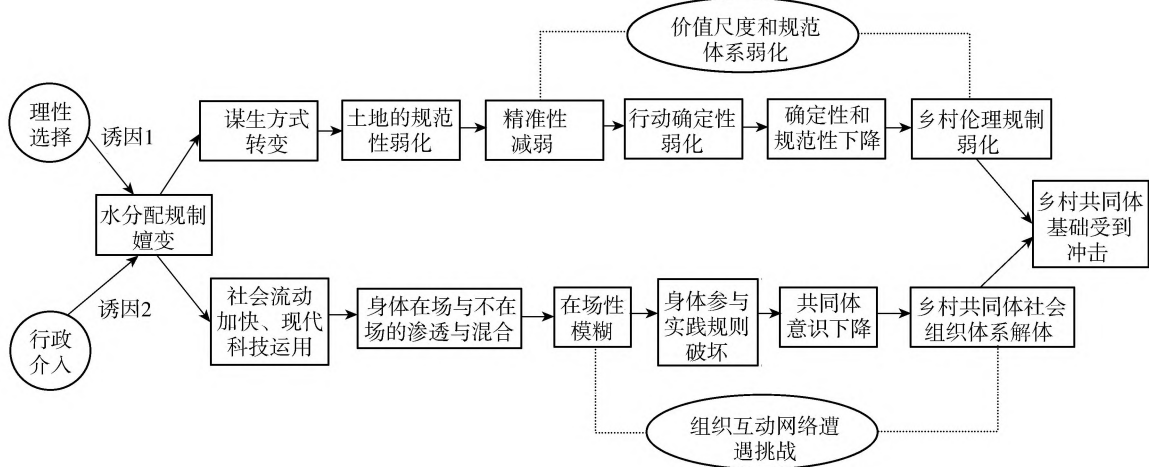


图3 水分配机制的嬗变逻辑

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的一种适应性,在无法规避一些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村庄成员各自做出理性选择。老年人群体凭借身体在场,遵循路径依赖的原则,展开身体交往互动,进而生发出与身体紧密结合的社会关系,延续了原有的身体在场关系;作为身体不在场的年轻人群体会利用媒体技术代替原本生物身体的功能,实现生物身体与社会身体暂时结合。然而,随着缺场频率的增加,两种身体会最终分离,这种分离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关系产生。

在现代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传统的精准性难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显现出有限的适用性,而实现精准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结合则需具备以下条件:土地与身体高度关联、村庄共同体意识强烈以及村庄拥有自主选择种植结构的权力,这就要求精准性的重建,即寻找一种传统伦理规制与现代伦理规制的平衡点。年轻人身体在场是实现两者平衡的关键,《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就强调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吸引农村人才返乡^①;新媒体推出的“农村新农人计划”其目的也是推动年轻人身体返回乡村场域,解决乡村人才短缺问题。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年轻人身体与场的关系。事实上,两者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长期身体的交往互动形成了场,而场又反过来规训了身体。如今,大量年轻人返乡创业是工具理性驱动下的行动,他们的身体与场之间并不是原本的互构关系。乡村年轻人大多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虽保留着乡村户籍,却缺少乡村记忆、归属和认同,当他们的身体重新返回乡村场之时,并不意味着能顺利实现契合。换言之,需要对这种精准性进行重建,从而实现两者的平衡。

因此,笔者建议利用老年人身体参与来实现精准性的重建。老年人身体具有在场历史记忆的特征,蕴含着过去的村庄记忆,拥有乡村伦理现代重建的道德文化之根——“记得住的乡愁”的属性^{[21]89},他们的参与可以更好实现乡土记忆和现代性的融合,共同建构新的精准性。现实中就有这样一批新农人,他们动员自己的父辈参与到“新农人项目”,双方分工明确:年轻人利用自身熟悉现代市场的优势,整合资源对接现代市场;而父辈深谙乡村伦理规则,容易

动员乡土资源,他们努力协调村庄资源,从事传统技艺。年轻人与父辈之间的分工,不仅是个体互动的呈现,更是两种伦理规制的结合,实践着精准性的现代转型与重建。

参考文献:

- [1] 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 唐晓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7.
- [2] 格尔兹.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M]. 赵丙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0-101.
- [3] 张亚辉. 人类学中的水研究——读几本书[J]. 西北民族研究,2006(3):187-192.
- [4]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32.
- [5] 张俊峰.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35-44.
- [6] 行龙. 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J]. 史林,2005(4):1-10.
- [7] 赵世瑜. 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2005(2):189-203.
- [8] 张俊峰. 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形成及其特点——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4):115-120.
- [9] 张小军. 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7(4):23-50.
- [10] 张佩国,王扬.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J]. 社会,2011,31(2):170-193.
- [11] 袁松. “买水之争”:农业灌区的水市场运作和水利体制改革——鄂中拾桥镇水事纠纷考察[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6):50-59.
- [12] 李华. 权力、技术与水分配政治——以河北石村集中供水项目为例[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8(11):135-138.
- [13] 祁建民. 水利民主改革与水资源公共性的彻底实现——以山陕地区水利社会史的变革为中心[J]. 广东社会科学,2018(3):125-135.
- [14] 王梅,角媛梅,刘志林,等. 哈尼梯田灌溉水源的分水木刻管理体系研究——以元阳县垭口大沟

^①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B/OL]. [2021-02-23]. www.gov.cn.

- 为例[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7(3):198-203.
- [15]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604.
- [16] FRISBY D , FEATHERSTONE M . Simmel on culture[M]. London: Sage, 1997:177.
- [17] 曹钺,骆正林,王颀濛. “身体在场”:沉浸传播时代的技术与感官之思[J]. 新闻界,2018(7):18-24.
- [18] 赵宪章. 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J]. 中国社会科学,2013(8):146-165.
- [19] 王美倩,郑旭东. 在场:工具中介支持的具身学习环境现象学[J]. 开放教育研究,2016,22(1):60-65.
- [20] 汪民安. 现代性[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7-178.
- [21] 王露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J]. 中国社会科学,2021(12):89-109.
- [22] 王露璐. 费孝通早期乡村伦理思想述析[J]. 齐鲁学刊,2017(5):96-100.
- [23] 苗国强. 反躬、再塑与实现:新型乡规民约与乡村伦理重构[J]. 齐鲁学刊,2019(4):117-124.
- [24]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8-59.
- [25]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敬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91-92.
- [26]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性[M]. 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2.
- (收稿日期:2022-12-13 编辑:高虹)

The Transfer of Accuracy and Presence: A Study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WANG Yijie, MENG H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water distribution link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members and rural communiti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water distribution in WM villages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Yunnan, and delves into the dynamic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evolu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ccuracy and presence are the two core elements of water distribution operation. Accuracy relies on precise time cells to generate certain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ember actions, which are generalized into certainty and standardization through long-term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ultimately form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ethical regulations. Presence,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the bodies of rural community members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relying on their physical participation in practice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ultimately generate a social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rural communities. The regulation of rural ethics constitutes the value scale and normative system of rural society, whil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of rural communities constructs an interactive network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which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two, maintains the stability of rural communities. The rational choice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forces are the two major incentives for the evolu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 The rational choice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leads to the loose connection between water distribution and land, reducing the necessity of water distribution. 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means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directly damages the autonomy and “self” needs principle of villages, and shakes the civil society founda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 With the long-term separ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land, the standardization attached to the land i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 accuracy in water allocation is weakened, and the presence is blurred, resulting in the impact on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people’s bodies and fields is the key to accuracy modern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accuracy; presence; evolu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 physical practice; rural social relations